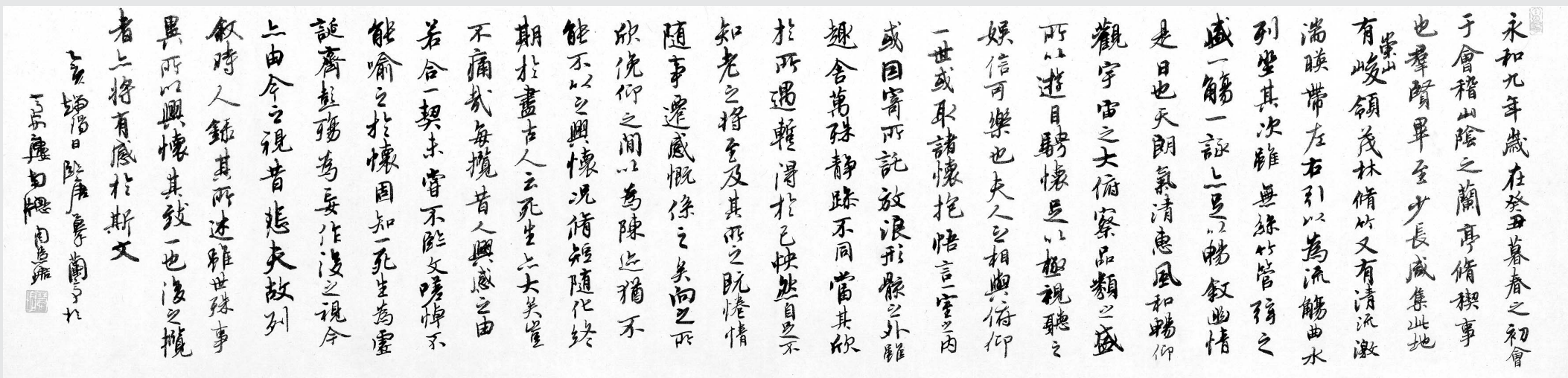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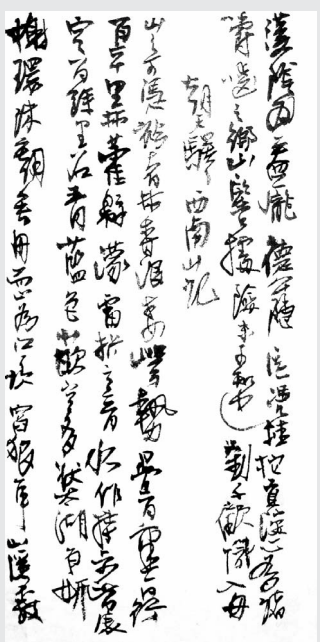
·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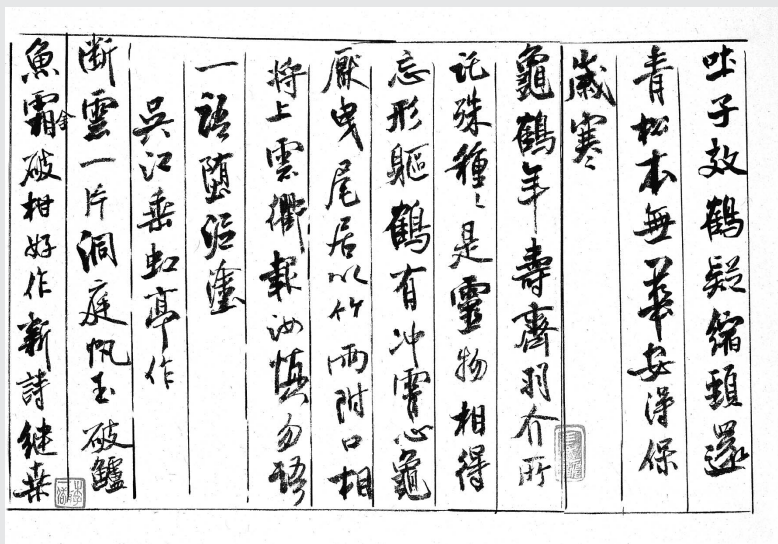
本期《上海书协通讯》新开“温故知新”临帖专版，欢迎广大会员踊跃投稿，请将实临或意临作品电子版照片及临书手记，或相关的理论文章发送至shuxiegongzuo@163.com，注明“温故知新”栏目组收，我们将择期刊载，并在上海书协微信公众平台予以连载发布。(临摹作品须以古代经典法帖为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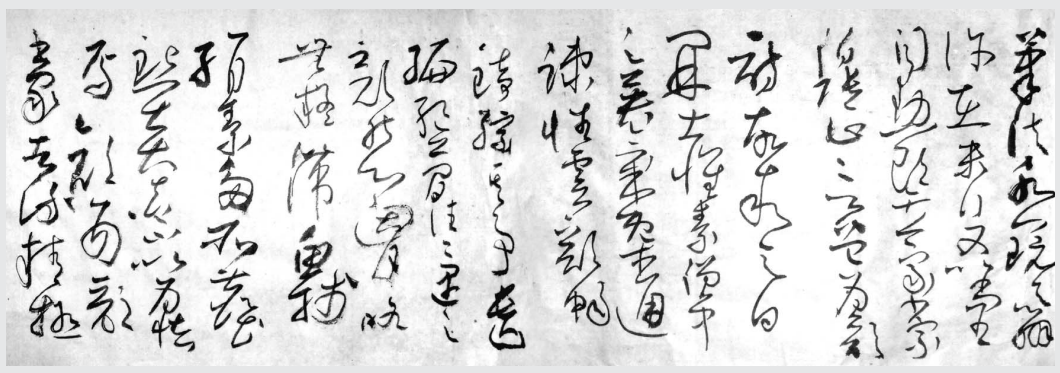
周慧珺临王羲之《兰亭集序》



李静意临王铎册页



李静临米芾《蜀素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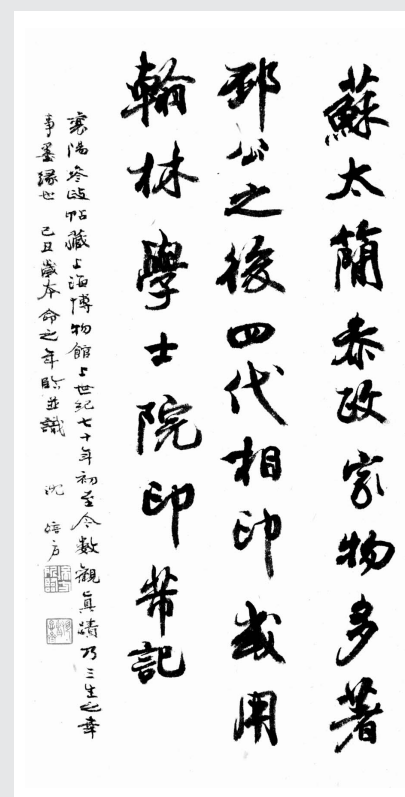
李静临怀素《自叙帖》

临书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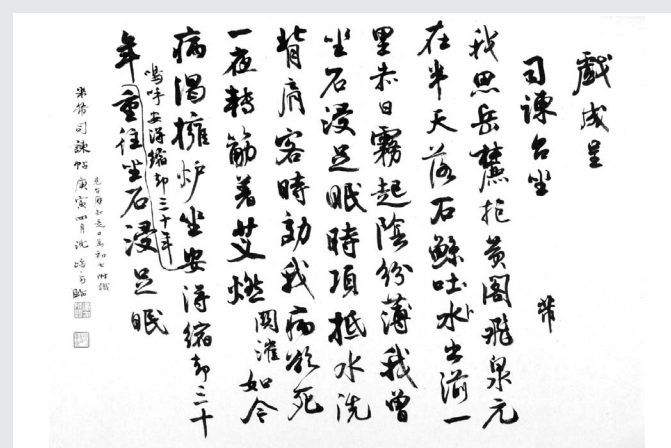
一、实临即是要尽量地接近原作。在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实临很重要。通过反复的临习可以使我们对书法的点画、结构及章法有一个真切的体验。在逐渐理解掌握的过程中娴熟地运用到实际的书写中去，从而达到入门。

二、意临是把牢记在脑海里的帖中字，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也可以说是印象式临摹。写意的成分居多。但如此写法须对原帖要有深刻的理解。力求在点画、结体、章法、气息、格调上与范本相关通。它的前提是要求我们对帖中字烂熟于胸，意临是检验我们对法帖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是从临摹过渡到创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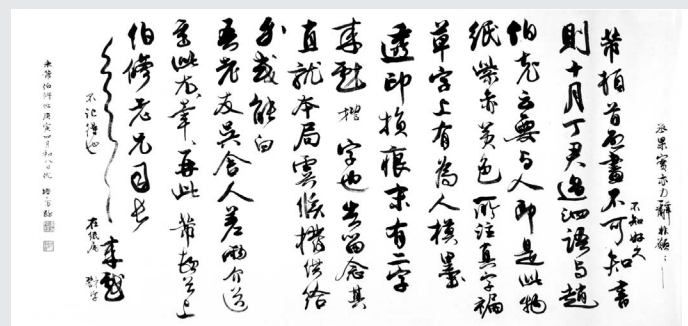
——李 静



沈培方临米芾《参政帖》



沈培方临米芾《戏成诗帖》



沈培方临米芾《伯修帖》

临书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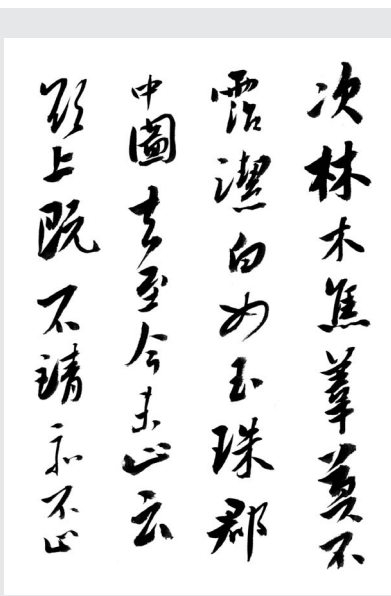
笔者五十岁以后，反复研究传世历代重要名迹，有所心得后以接近原帖的尺寸幅式，陆续通临了百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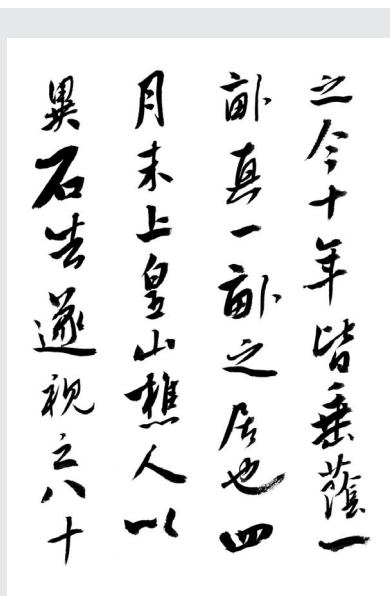
据统计，现存米芾真迹约72种，书写时间跨度约27年，其面目件件不同。即使是同一年、同一时期的墨迹也书风迥异。如写于元祐三年(1088)的《叔晦帖》、《苕溪诗帖》、《蜀素帖》即可窥得，而后两帖相隔虽仅一个半月，但各呈异彩，令人击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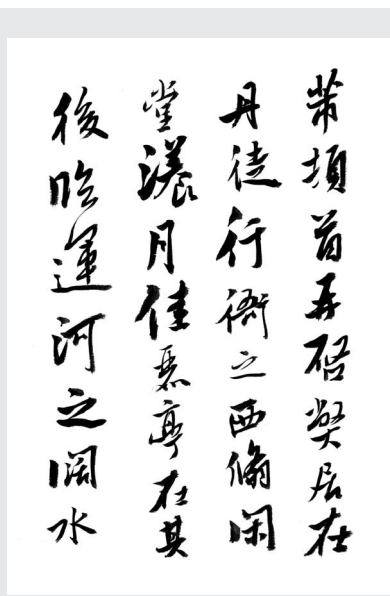
为了尽可能演绎米芾墨迹的多样变化，笔者有意以十年时间研临全部米帖，以期拉开差距，避免雷同。其间，通过研究原迹内容，获取米芾书写时的年龄、处境、游历、与受书人的关系和所涉事件，以及当时米芾借鉴传统的真实状况等详细信息，在有足够的认知和领悟后一气“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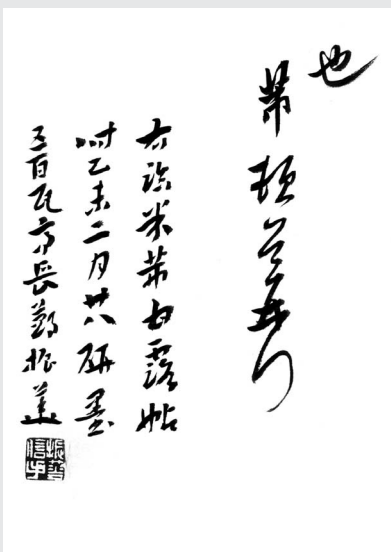
临帖若简单地模仿很容易，但得其形神不易。倘要做到形神兼备，非得下大功夫研究原迹的来龙去脉，在具备足够功力的前提下，面对原迹，能体悟到其挥运之时的情境，才有可能基本达到“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孙过庭《书谱》)的境地，其中“由”字一义，尤宜深省。兹选临米三帖，请教同道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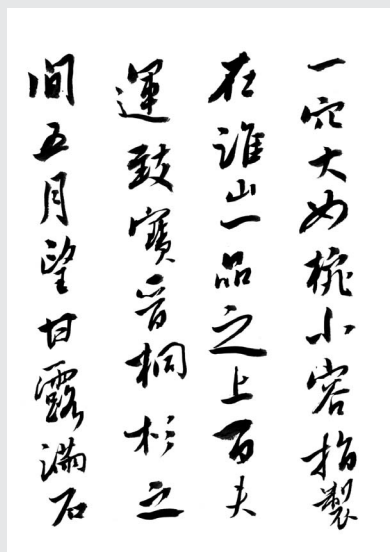
——沈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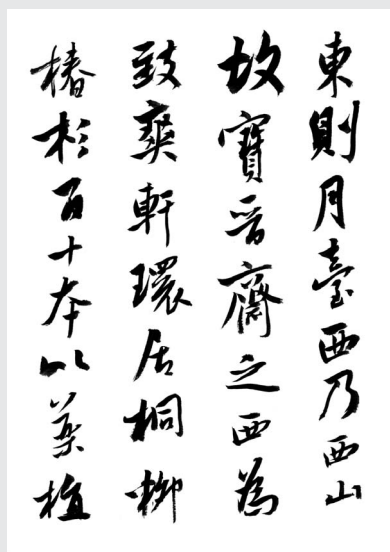












郑振华临米芾《甘露帖》

临书手记

今年3月5日，应上海台办之邀赴台北交流，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中一项活动。正巧米芾《甘露帖》真迹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厅展出。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啊，相见恨晚。

《甘露帖》米芾书，又称《弊居帖》，纸本，行书，纵35.5CM，横50.3CM。《历代书法墨迹大观》有此帖，未曾临过。当时因印刷技术有限，分辨不出精妙之处，而今观真迹之后，有强烈的临写欲望。

米芾书法师羲献而更张扬，落笔处方圆兼施，沉着痛快，转折处提按分明，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细细辩之，投射出不少二王的信息。学习二王书法，从米入手亦是一条径路，学习书法应多看真迹，一定会有很大的长进。

——郑振华

碑帖鉴定摭谈(一)

仲威

碑帖其实是“碑类”和“帖类”的集合名称。“碑类”包括碣石、摩崖、碑版、墓碑、墓志、塔铭、造像题记、经幢、石阙铭等等数十个品种，这些石刻品种形式虽“五花八门”，但其记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载体功用却是一致的。“帖类”包括“丛帖”、“汇帖”、“单刻帖”等，其形式虽多为统一的长条石，但其记录的内容却相当庞杂，诸如辞翰、诗稿、尺牍、文书、题跋、便签等多种类别，其收录的标准，简单地说，那就是文辞好和书法美。

“碑类”和“帖类”除内容与形式不同外，其功用亦各不相同，“碑类” 的原始功用就是要使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通过铭刻而流传千古的，其刊刻目的很明确，是希望让后人去“读”的。“帖类”的功用是记录和传播书法名作为基本出发点的，进而为读书人提供学习书法的范本，其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让人们去“临”(临摹)的。

两种原本不同功用的“碑”与“帖”，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却逐渐地发生了转化与融合，在立碑刻石的数百、上千年后，“碑类”中的杰出代表，逐渐地被追封为“书法经典”，亦成为后人的临摹范本，这当然是后人的一厢情愿，完全超出原碑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帖类”的刊刻内容，其文献价值亦逐渐凸显出来，也成为后人“研读”的史料或文献，这同样也超出了刻帖者的原始初衷。

随着传拓技术发明与广泛普及，使得“碑类”与“帖类”又以拓片的形式得以交汇，出现了“碑帖拓片”这一称呼，使原本不可移动的石质文献、法帖版刻得以化身万千，并以纸质文本形式(拓片或拓本)走进寻常人家，进而成为“碑帖鉴定”的研究主体。在此，需要明确的是，“碑帖鉴定”是指碑帖拓片(或拓本)鉴定的简称，其实就是拓片(或拓本)的鉴定，而非鉴定碑与帖的刊刻原石。

说到拓片，自然是以碑帖的拓片为主体，但是严格地讲，还应包括青铜器与甲骨的拓片，古人笼统地将碑帖归入“石类”，而将青铜铭文纳入“金类”，使得两者共同组成“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但是，“金类”拓片的历史和规模远不及“石类”拓片的悠久和众多，加之两者研究的视角和方式亦不尽相同，所以前人的“碑帖鉴定”几乎多不涉及到“金类”，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的规则。

其实，碑帖鉴定就是在辨别真伪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和评判碑帖拓片的珍贵程度，其立足点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那就是被文博界普遍认定的三种价值，即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可以理解为拓片的拓制年代久远以及传世藏本数量的稀缺等；艺术价值顾名思义就是指碑帖的书法艺术、拓制艺术、装裱艺术等；史料价值不仅包括碑帖自身的文献价值，同时还包括碑帖拓本所附加的历代名家批校、释文和题跋等。

就碑帖这一特殊文物而言，上述三种价值中“文物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关键所在。虽说碑帖亦属特种文献资料，但是历代名碑名帖在传世古籍文献中多有著录，或存目或录文或跋尾，故其史料价值在拓本上反倒并不十分凸显。再者，即便是新近出土的重要碑刻，虽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但是，此类碑刻一经发现就被文博研究者或著录或出版，待到百年后，其拓片初具文物价值时，碑文的史料价值早已时过境迁，成为过期货。其实，碑帖的真正文献价值是靠历代名家题跋考释来不断添补的，随着历代名家的离世，其题跋遗迹的珍贵性亦与日俱增，旧日题跋的文献价值又进一步转化到文物价值上，这些都不难看出对碑帖“文物价值”的考量，在鉴定环节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文物界又是如何判别碑帖的文物价值呢？我们常常会从“拓制年代久远”与“传世藏本稀缺”两个方面去着眼，但两者孰轻孰重呢？笔者以为当以“传本稀缺”为主，而以“拓制年代”为辅。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切早期拓本的珍贵性都要超过晚期拓本的。例如：宋拓《九成宫》、《集王圣教序》等传本较多，反不如明代出土的《常丑奴墓志》和清代出土的《崔敬邕墓志》等稀见品种来得珍贵，因为《九成宫》、《集王圣教序》之传世宋拓本的数量往往多在数十件以上，而《常丑奴墓志》、《崔敬邕墓志》传世拓本仅为六七件而已。此外，海内孤本《张黑女墓志》、《章吉老墓志》、《王子晋碑》等均非宋拓，其文物珍贵程度显然亦远远高于传世数量较多的宋拓本。由此可知，评判碑帖的文物价值时绝不能“唯宋独尊”。

文物的流传数量直接关系到文物的珍贵程度，这点是无容置疑的，但是在碑帖的传本数量上却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点还常常会引起收藏起步者的误读，这种误读一般会导致两种倾向：其一是看低碑帖的文物价值，以为既然《九成宫》等传世名碑历代留存数量众多的，其文物价值势必不高。其二是看高碑帖的文物价值，收藏新手往往会争购历代名碑名拓，以为收藏名碑拓本就是收藏文物。导致这一误读就是缘于同一种碑帖会有宋拓本、明拓本、清拓本、近拓本、翻刻本的分化，大多数碑帖的传世拓本数量多呈现出一种金字塔样式，塔尖是宋拓，塔座是近拓，其中一部分是文物，极少部分还会是珍贵文物，另一部分至少在目前还不是文物，还有一部分比如是翻刻，将来亦很难成为文物。说到底，碑帖拓片是文物门类中区别于书画的特殊的“印刷品”。

谈及印刷品，就不能回避碑帖拓片的“近亲”古籍线装书，它们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传本流通环节上却有不小的差异，这就是碑帖拓片不同于古籍线装书存有“复本”的情况。就线装书而言，某个年代的古籍刻本大多只能在那个年代批量(成百上千)印刷，我们将这些同时期的完全相同的印本称之为“复本”，古籍线装书较少见有隔代修版重新印刷的。碑帖则不同，古碑能在宋代拓印，也能在明清乃至当代拓印，不同时期的拓印，当然拓片面貌、拓制手法、纸墨材料各异，故碑帖拓本出现“复本”的情况较为少见，年代越是久远的碑帖拓本遇上“复本”的概率越是低，甚至几乎为零。即便在过去的某个时日拓印得到数件相同的拓片，假定它们都得以幸存流传至今，相同的拓片经过历年的分散收藏，留下了不同的收藏者题跋和印章，并装裱成各种样式，或卷轴或册页或线装等等，致使其个性化的成分相应增加，排他性也随之提高，故这些拓本也就不能再被视为“复本”。因此，碑帖拓片的鉴藏，应更多地关注其流传源流与递藏关系。

通讯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238号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电话：62494921 邮政编码：200040 本报电脑排版由组织人事报电脑照排中心承印